

學人往事

風雨如晦，弦歌不輟： 袁同禮與現代中國學術

● 王晴佳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源泉，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其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而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圖書館在五四時期的發展，迄今尚有些語焉不詳。當然，中國現代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似乎均與圖書館有緣：李大釗之外，還有毛澤東和顧頡剛。他們在圖書館工作的經歷，在他們之後的事業中留下顯著的痕迹。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研究人員雷強花十年心力編纂的鉅著《袁同禮年譜長編》（共五卷，3,200頁；以下簡稱《年譜》，引用只註卷數及頁碼）^①，不僅讓我們認識一位重要的五四圖書館學家——袁同禮（1895-1965），還有助我們深入了解中國現代圖書館的發展與現代中國學術之間的密切關聯。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年，但其主角均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年，因此筆者稱他們為「世紀末」（fin-de-siècle）的學人。說起「世紀末」作為一個文化現象，美國思想史名家休斯克（Carl E. Schorske）著有《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的名著，獲獎無數。但休斯克描繪的處於「世紀末」維也納的名人（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儘管個人成就非凡，但譜寫的只是一曲「末世」的悲歌——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轟然倒塌。而中國的「世紀末」學人，卻親身經歷了民國的建立，並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長足進步貢獻卓著。與傅斯年、羅家倫等叱吒風雲的五四領袖同為北京大學學子的袁同禮，正是在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轉型與發展中，留下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

一 五四啟蒙：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

袁同禮（字守和）出生於北京書香之家，其父袁承忠為清末秀才，祖父袁廷彥曾任刑部主事。袁同禮於1913年入讀北大預科英文部，成績優異。1914年春北大預科成立了文學會，有國文和英文兩部。傅斯年為國文部副部長，毛子水、顧頡

剛為文牘，而袁同禮是英文部的文牘兼編輯長，次年又出任英文部部長。1916年夏袁同禮從北大畢業，立刻被清華學校（1928年改稱清華大學）聘為其圖書館的「英文兼圖書助理」，開始了他長達一生的圖書館學家生涯。

袁同禮在北大的求學生涯，與他的同學傅斯年、顧頡剛顯得不同。當袁在預科學習階段並顯出他出色的英文能力的時候，顧還每天沉迷於聽京戲，而傅則以其舊學根底，在同學中獲得「孔夫子」的暱稱。他們接受新思想的薰陶，應該是在1916年預科畢業之後、繼續在北大從學於1917年歸國的胡適才開始的。還有一個不同是，作為一個清華的職員，袁未在五四運動爆發之際，像傅斯年、羅家倫那樣衝向街頭、振臂高呼。不過，他顯然支持北大師生探索、開創新文化的舉動。譬如傅與同學在1919年創辦《新潮》之後，立刻給袁寫信：「敝志《新潮》定於本月十一日印就，弟已囑敝校出版部寄贈吾兄一份，寄貴校圖書館一份，貴校學報一份，想二三日內可以收到。同社中囑弟轉托吾兄在清華代為銷售，未審可否？如無不便之處，當寄上若干冊……」得到袁的同意之後，傅給他寄了四十三冊，並告知對方：「第一期業已售罄。」（第一卷，頁57-58）



袁同禮在現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中留下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圖片來源：清華大學校史館網）

袁同禮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行動是協助推廣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清華的學生希望成立「白話文學研究會」，他立即邀請胡到校。胡接受了邀請，用淺白的白話文作答：「守和先生：來信說清華學生要辦一個『白話文學研究會』，我聽了非常高興。那時我若有功夫，一定來加入討論。」胡既然願意支持清華學生，他的到訪也就被安排成一場講演；他在清華學校禮堂作了「白話文學何以必須研究」的講座。不過講演那天，袁並不在場。胡事後給袁這麼寫道：「前幾天在清華，可惜不曾見着你談談。」（第一卷，頁62、66）胡實踐、推廣白話文的努力，通過這些信件交流而躍然紙上。與之相比，其他人那時與袁的通信，包括胡的留美同學任鴻雋，均用文言。《年譜》收入的這些書信來往，展現了當時文化變革的歷史現場。

新舊語言的交替使用，更見於老同學傅斯年與袁同禮的通信。如上例所示，傅希望袁代售《新潮》，用的仍然是文言。但他在1919年北大畢業考取山東省的官費留學之後，給袁寫了一信：

守和我兄：兩月不見，想你的很！我久有住清華園快談幾天的意思，只是沒有時候。……現在我考留學取錄了。八月中旬往英國去。又要好幾年不能見

面！平日在京！不覺得甚麼；一旦要出中國，覺得許友〔多〕戚友、同學都不願遠遠離開；所以我近來心裏老實不暢快。（第一卷，頁70）

傅考取出國的歡快和對好友的思念，均在這些基本白話的句子中呈現了。不過有趣的是，傅之後與袁的通信，又轉為相對客套的文言。

傅斯年的留學生涯，開始於英國。袁同禮此時也有此念，希望找機會出國深造。1920年初他與胡適見面，相談一小時，應該是諮詢留學的相關事宜。之後他獲得北大的資助出國留學，同年8月去了美國。他在去國之際，向胡作別，抵達夏威夷的時候，又寫了明信片給胡：「適之先生：別後三十一日抵橫濱，次日東行，今日安抵檀香山，毫無暈船之苦，堪慰遠念。」（第一卷，頁83）袁於9月到達美國東岸，入學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如所周知，傅在留學歐洲期間，一心想追求「真學問」，也即掌握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所以科目涉獵很廣^②。與之相比，袁則十分專一；北大資助他留學研讀圖書館專業，他對之十分敬業，不僅在美國西岸參觀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圖書館，還去了那裏的公立圖書館。他入學哥大歷史系之後，亦很快加入了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22年袁從哥大畢業，申請入讀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他在寫給蔡元培的信中說道：秋天從哥大獲得學士學位之後，才能申請該校，因為「此校入學資格極嚴」。11月，袁不但如願以償，順利入學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還應邀在美國東部各大學圖書館館長年會中，作了題為「中國圖書館問題」的演講（第一卷，頁83-87）。

袁同禮希望在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深造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由蔡提議，北大同意資助袁在美留學延期一年。袁也知恩圖報，在美期間努力為母校的圖書館出力。他曾與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聯絡，讓其給北大圖書館贈送藏書目錄卡片（card catalog）。他也代表北大與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接洽，成功讓後者給北大圖書館贈書四百餘冊，價值2,000美元。在從事這些活動之餘，袁努力學習圖書編目、檔案管理等業務，希望將來為推進中國的圖書館事業服務。不過可惜的是，他本以為自己可以在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獲得現代的圖書館學知識，入學之後卻讓他有所失望，發現「好教員不多」，因為「美國圖書界年來傾向群趨於普及，故學校亦僅注意小圖書館，往往不能應吾人之需要」（第一卷，頁93-114）。袁的這一表述，反映他那時留學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中國的圖書館學，希望為提高中國的學術水平服務。既然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讓他失望，他在修完其基本課程之後，即去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後又奔赴歐洲，註冊成為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的研究生，也曾在法國國立圖書檔案專科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學習。

1924年夏天，袁同禮在負笈歐美四年、獲得了哥大歷史系和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的兩個學士學位之後回到了北京，出任北大教育系講師，講授圖書館學和目錄學等課程。作為當時少數受過系統現代圖書館學訓練的專業人才，袁雖未及而立之年，卻在那時中國現代圖書館的籌建與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創建過程

中發揮了核心性的領導作用。首先，袁本人不負眾望，憑藉自己的英語能力，積極與外國的圖書館聯絡，爭取對方贈送書籍或目錄卡片。他也在外國圖書館專家來華期間，擔當了主持講演和翻譯的任務。本文開頭提到顧頤剛，他與袁為北大同學，但兩人在1925年前似乎並不熟識。顧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發起的「古史辨」討論，一定引起了袁的注意，於是袁主動聯繫了這位北大同學和圖書館同行，希望顧加入中華圖書館協會，而顧則以自己不擅社交和事多卻之。但有趣的是，數月之後，兩人終於有機會見面，之後交往便多了起來。《年譜》所載顧曾在1926年數次致信袁，並在《古史辨》出版之後寄贈一冊給袁。顧離開北大去廈門大學任教，袁還設宴為之餞行（第一卷，頁116-53）^③。

袁同禮在那段時期，不但事業蒸蒸日上（例如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支持成立的北京圖書館圖書部主任），個人生活也有進展。1927年3月袁同禮與袁慧熙訂婚，兩個月後兩人結成連理。袁慧熙原籍浙江，為名門之後，其外祖父袁昶是光緒二年（1876）進士，先任戶部主事，後在陝西和江寧任職，再回到北京出任二品京官，為光緒帝所器重。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時，他慷慨陳詞，希望遏止義和團刺殺外國使臣的行為，並強烈反對慈禧太后向列強各國宣戰，最後在北京菜市口被處死，成為「庚子被禍五大臣」之一。八國聯軍撤出北京之後，清廷才為之平反。而當時主張借助義和團向西方開戰的剛毅、毓賢、徐桐等人，則因列強要求而受到懲處。近代中國政治的波譎雲詭、風雲變幻，可見一斑。

袁同禮新婚燕爾，帶着妻子去了日本。但他不忘工作，不僅在那裏調查日本所藏《永樂大典》的情況，還訪問了日本內閣文庫，查看其所藏的中國古籍。蜜月結束回國，他出任北海圖書館館長，之後又擔任籌建中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1928年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即刻與袁聯繫：「敝所草創伊始，諸待進行，圖書設備尤覺缺陷，希將貴館藏書目錄賜寄一部，以便設法抄錄，無任銘感。」（第一卷，頁170-211）傅此舉不但是因為兩人是老同學，更因為袁是圖書館事業的一位精力充沛、能力實足的實幹家。如《年譜》所示，袁那時以其嫻熟的英文水平，與歐美各大圖書館頻繁聯繫和交流，為推進中國現代圖書館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1929年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平圖書館」）成立，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出任館長，年富力強的袁同禮任副館長和執行館長（acting director），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第一卷，頁243-78）。

二 抗戰守藏：烽火中的文獻保存

袁同禮在民國期間為圖書館事業奔忙，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他個人的投入和才幹，也得益於北伐的成功，中國獲得了短暫的統一，朝着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邁進。可惜好景不長，1931年3月北平圖書館新館甫成，9月日本便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東北三省。如果說二十世紀20年代是袁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階段，其間他成功地成為中國現代圖書館學的創建人之一，那麼自30年代開

始，他的人生便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日本侵華顯然有礙於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但在這風雨如晦的年代，袁那時的作為，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卻又十分讓人欽佩和崇敬。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一周，袁同禮即用英文致信與他經常聯繫的瑞典漢學家赫定 (Sven Hedin)，表示了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憤怒：

此次日本人的行徑確實過分，其程度甚至超出了他們外務省認可的範疇。局勢充滿危險，我無法預見每日湧現的複雜事態將如何收場。這場無端攻擊完全出乎意料，政府正在採取審慎政策。儘管日本在西方擁有強大的宣傳機器，但事實擺在眼前，我相信世界不會被蒙蔽。(第一卷，頁376-77)

翌年1月，日軍又在上海悍然挑起「一二八事變」，袁同禮立即與胡適、蔣夢麟、丁文江、傅斯年等人聯名致信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 (A. Lawrence Lowell)，一方面感謝他向美國政府建議支持中國，另一方面也籲求各國與中國站在一起，「履行其所應盡之義務，立取有效行動，以維世界和平」。此後不久，袁結識了任教哈佛、正在北平搜集中文材料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第一卷，頁397-98)。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袁與當時負責美國出版物服務處 (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 事務的費緊密合作，安排美國圖書館向中國贈書、與中國圖書館交換藏書目錄等，譜下了中美兩國在日本侵略時期協力維繫圖書館事業的一個重要篇章^④。1939年2月，當袁得知費在哈佛成立了向中國贈書委員會一事之後，寫了一封英文長信給費，感謝對方的努力，並告知中國那時急需何種書籍。譬如在社會科學方面，他說中國需要有關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論著。同時他也告訴費，戰爭爆發之後，北平圖書館已經在昆明發起了一個「戰爭資料特藏」(Special War Collection) 計劃，希望對方從史家的立場給予支持和指導。他在信的結尾處寫道：「我想補充一點：儘管處於這場未曾宣戰的戰爭 (undeclared war) 當中，中國仍有大量科學研究工作在持續進行。即便處於衝突與動盪之中，也總會有積極的消息傳來。」(第二卷，頁966) 他的結語表現出對日寇侵略的不屈和反抗。那時袁給外國友人的信件中，一直稱抗戰為一場「未曾宣戰的戰爭」，顯然是為了強調日本侵華的卑劣的、違反國際法的行徑。

筆者以為，袁同禮作為中國圖書館界的領導人物，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對中國學術主要作出了三個方面的貢獻：一是如上例所述，以北平圖書館執行館長和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的身份，用嫻熟流暢的英文與歐美圖書館界和學界的人士聯繫，希望對方向中國贈書，支持中國剛剛起步的科學研究事業。在費正清之外，他那時還致信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協會、史密森學會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國博物館的集合組織) 和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等機構，希望它們向中國贈書和提供資助。同時，他還通過熟識的歐洲漢學家，向歐洲的大學和圖書館求助，希望它們共同協力，為保持和延續中國學術的文脈作出貢獻。袁的熱忱懇切和對中國抗戰必勝

的信心，感動了對方。譬如曾向牛津大學捐款設立多項獎學金、積極推動對華贈書的石博鼎 (Henry N. Spalding) 在他的覆函中寫道：「奉到二月二十日函惠，使敝人非常感動！貴國文化機構能在異常困難環境之中，努力前進，繼續工作，欽佩莫名！……吾人深覺貴國不僅為自由而戰，實為擁護全世界人類之自由與人道而戰也。」(第二卷，頁988-89)

二是在烽煙四起的戰爭年代，堅持推動和擴大國際學術交流。袁同禮自擔任北平圖書館的執行館長之後，將北平圖書館的藏書製成目錄卡片，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其他歐美圖書館交流，對方也將中文藏書目錄的影照本交與中方。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他的這一舉動不僅有助國際交流，而且有先見之明，可以讓海外知道中國的藏書狀況，清算日本侵華對之所造成的破壞。他還積極培養年輕一代的中國圖書館專業人才，比如派送王重民去巴黎謄錄關於敦煌的卷宗、讓任職南京和上海分館的錢存訓護送善本去美國國會圖書館保藏(下詳)等——錢後來長期任職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成為著名的中國書目學專家。

袁同禮能推動這些交流，以其與西方漢學家、圖書館學家的長期交往為基礎，譬如他與美國漢學家、任職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恆慕義 (Arthur W. Hummel, Sr.) 為老友，《年譜》中也收入了他與曾任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和美國目錄學會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會長的凱歐 (Andrew Keogh) 的許多通信。又如，法國漢學名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在1932年底和1933年初訪華，袁與之交往密切，建立了合作關係。伯希和抵達中國之後，中國學界的名流五十餘人參加了法國駐華公使在使館舉辦的歡迎宴會，其中有李書華、蔣夢麟、胡適、傅斯年、顧頡剛、陳垣、陳衡哲和袁同禮等。之後袁請伯希和到北平圖書館聚會，並邀請他去參觀故宮博物院舉辦的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畫作展覽、贈予對方北平圖書館所藏伯希和的著作目錄等。伯希和也投桃報李，回國之後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元朝秘史》一書製作了影照本，贈予北平圖書館；其後伯希和也幫助袁的弟子王重民去法，後者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第一卷，頁432-38) ⑤。

三是在與國際學界開展交流的同時，面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積極應對，未雨綢繆，為保存中國的古籍善本採取措施。1933年1月10日，袁同禮參加了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語所舉辦的宴請伯希和的活動。次日他接受記者採訪，便談及北平圖書館善本裝箱的情況。然後12日北平圖書館召開第八次會議，集中討論了如何保存善本的問題。13日他又參加了故宮博物院召開的臨時緊急會議，商議故宮文物南遷的事情。於此前後，袁與當時的教育部和其他機構一起，為《四庫全書》、《四庫孤本叢刊》和《四庫善本叢刊》籌劃「影印」(即製作成微縮膠片)事項。因為操辦此事，牽涉精力和人員很多，他還取消了赴日訪問的計劃，其中或許也有中日關係緊張的因素(第一卷，頁435-41、458-93)。

袁同禮在抗戰期間為保存中國文脈所付出的努力，無疑是他對現代中國學術最大的貢獻。他將北平圖書館的善本裝箱南運，由錢存訓具體操辦，最終克服重重困難，海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堪稱中國圖書館史和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壯舉。面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擴大，袁等人認為善本撤出北京、暫存上海之後，仍

然需要找個地方安全保存。他在1940年10月便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聯繫，詢問是否可以讓美軍將善本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對方也可藉機拍攝該批圖書的微縮膠片。同時他聯絡在上海保管善本的錢存訓，讓他負責監運。11月袁致電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希望他與美國國務卿辦公室聯繫，安排這批善本運往美國。他在給王重民(當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信中說，「美大使已發三電〔給國務卿辦公室〕，而至今仍未覆音，甚以為怪」。為此，袁又親自去美國駐華使館，告訴對方善本共裝了三百箱，其中十箱屬南京中央圖書館，現存上海法租界，希望美軍幫助海運。恆慕義也表示願意來華協助運送。得到這些資訊之後，詹森再次發電給國務卿(第二卷，頁1208-12)。

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袁同禮此時也有代表中國政府出訪美國的計劃，並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訂了船票，打算於1940年2月啟程。他在給基金會的信中說：「我此次出訪的目的之一便是致力於推動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與傳播，計劃籌辦中美文化交流專案。該專案不僅致力於促進兩國圖書館間的文獻資料快速流通，更着眼於推動博物館間文化資源的交流互通。當世界各國正全力投入軍備與國防建設之際，我不確定此時向美國公眾提出此項倡議是否合宜。儘管如此，我仍將起草一份簡短的備忘錄，期待近期能呈請您審閱。」(第三卷，頁1222)袁同禮在信中所說的與他寫給費正清的信類似，表現出面對一個烽煙四起的世界仍然不屈不撓地為中國文化事業奮鬥不息的精神。在袁同禮晚年，他曾不止一次對次子袁清感歎現代中國經歷的烽火連天歲月，但相信以中國人的聰明苦幹，如果假以和平時機，一定會建立起一個強盛的國家。袁清回憶其父時慨歎道：「很遺憾，他一生真沒有體驗過幾年的太平！」^⑥顯然，如果說中國人勤奮刻苦，那麼袁同禮本人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他在戰爭期間為保護中國古籍和文物所做的努力，真可謂殫精竭慮、嘔心瀝血^⑦。

袁同禮試圖赴美的計劃，與護送和保護北平圖書館善本同步進行。雖然美方願意代為管理此批珍貴書籍，但真要將其搬離法租界還需上海海關放行。而美方又希望此批書籍先用商船運到菲律賓，然後由美國海軍運往美國，期間頗費周折。他從北京抵達香港之後，數次為此事返回上海，因此赴美計劃一再延遲。袁於1941年10月30日給胡適的信中描述道：「平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壹佰箱已分數批運美。因海關不肯負責，不得不特別慎重，收件之人必須時常更換，以免引人注意……又因搶運性質，故只要能謀到船上艙位若干即寄若干，幸均安然出口，如釋重負。」他為此所費的大量精力和努力，可見一斑，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告訴胡適道：「最近舍下長幼三人均患盲腸炎，而次女〔袁桂〕以割治稍遲，竟因之夭傷。」而且，因為太平洋戰爭於該年年底爆發，袁一家滯留淪陷的香港，生活頗為困難，常常向人借貸度日。日本人向其和陳寅恪發出邀請，希望他們能進入偽廣州大學任教，均遭到兩人的拒絕。最後直到1942年6月，袁才得以攜家人離開香港，成功脫險，回到內地(第三卷，頁1266、1274)^⑧。

萬幸的是，袁同禮個人和家人雖然經歷了戰爭的磨難，但他心心念念的北平圖書館善本在1941年10月開始陸續運出，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神秘地」成功運往

美國，經由中國駐美大使館點收之後，移交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這裏筆者用「神秘」一詞是因為根據當事人之一錢存訓的回憶，當時日軍已經包圍了上海租界，要想將這批書送到碼頭交給美方已經十分困難。錢託人找到海關的朋友，對方願意在他值班之際，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購買新書的名義，將這批善本分十批送上船。最後一批於12月5日由上海駛往美國的「哈里遜總統號」(SS President Harrison)裝運，但太平洋戰爭兩天後爆發，該艦未能抵美，所以這批善本如何安全無誤地抵達美國，至今是個未解之謎。錢的猜測是，「哈里遜總統號」因戰爭爆發被美軍臨時徵用，這最後一批善本應該是轉到其他商船而抵達美國的^⑨。或許，袁等人為保護善本所付出的心力和辛勞，感動了上天，獲其垂顧而讓這批珍寶得以全數抵美。順便一提的是，袁在完成此項任務之後，還關心南京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善本下落。可惜的是，《年譜》記載那批善本未能及時運出，失陷於香港(第三卷，頁1261)。

上面已經提過，袁同禮和北平圖書館的同仁將善本裝箱南運的時候，共有約三百箱。到了上海之後，他們對其做了挑選，裝了102箱(二千多種，逾三萬餘冊)運往美國。袁給教育部的密函中寫道：「此項運出善本，均以宋元明刊本及名人鈔本校本為限，其較次之清刻善本，時間不及裝運。」(第三卷，頁1281)這批留滬的善本和其他書籍，在日本投降之後大都由國民政府收回。而運美之後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管的102箱善本，則於1965年袁過世的幾個月後完璧歸趙，全部交予台北中央圖書館，後來移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新建的善本書庫，保存至今^⑩。

袁同禮出訪外國一事，直到1944年底才得以成行——他由行政院指派於11月30日從成都搭機到印度，然後經非洲於12月抵達美國，直到次年7月才離開，轉道倫敦、巴黎和羅馬回國。與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時相似，袁在美期間訪問了不少學者、在公私團體發表演講、參加新成立的聯合國的相關會議、走訪美國政府機構、促進兩國之間的圖書交流等，加強了美國作為戰時重要盟國與中國的文化紐帶。他的努力也得到了美方的認可：母校哥大校長出面宴請，匹茨堡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美國圖書館協會聘他為國際交流顧問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袁由教育部指派，再度出訪美國和歐洲，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會議、查看流落到德國的中國文物等^⑪。

三 海外耕耘：晚年著述與精神傳承

1946年秋天袁同禮二度訪問歐美回國之後，全力以赴投入恢復北平圖書館的工作。然而，國共內戰旋即開始，隨着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節節失利，國民政府人心渙散。經歷戰爭風雲的袁一時並未氣餒。1948年12月上中旬，他回答記者詢問的時候，仍然堅定表示北平圖書館「將繼續開放，並未考慮南遷，外傳遷移廣州之說為謠言」。但大約十天之後，袁告訴同事他已決定南下，並於21日匆

忙搭機攜夫人和三個孩子去了南京。在南京，蔣介石會見了他與其他學界名流，不過袁顯然不打算隨國民政府赴台。1949年2月初他帶全家坐船去了美國，3月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文獻顧問，「該職務並非正式館員，主要工作是對1947年以來入藏的中文善本進行編目、著錄，有少許薪水」（第三卷，頁1784-1823）。自那時開始直到他逝世的十六年間，袁的學術生涯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一時期，他許多時候工作無着，又拖家帶口，過得頗為艱難，與之前兩次訪美相比，其境遇幾成天壤之別。但袁作為一個圖書館學家的執著、堅持和勤奮，在這段時期又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積極申請各項資助，著書立說，給後人留下大量有益的著作，為促進中外文化和學術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雷強所著《年譜》，因此填補了中文學界對袁同禮晚年學術認知上的空白，具有重要價值。

筆者僅舉一例來看一下袁同禮一家1949年抵達美國之後的遭遇。他們匆忙離開中國後首先抵達美國西岸，與任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趙元任相會，兩家相聚甚歡。之後袁同禮和家人到了東岸的華盛頓，在給趙寫的信中形容了自己的困窘：「伯克萊小留，諸承款待，瀕行復蒙走送，厚意隆情，心感無似。到華京後以覓房不易，暫住apart式之旅館，幸有廚房設備，自己燒飯，尚屬經濟。偶有適當之房，均在Maryland一帶，以無汽車，頗不方便，現已由友人另覓一房，尚未決定耳。」（第三卷，頁1815）相較之下，袁同禮戰後回北平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時候，居住環境十分寬敞。資中筠與袁家長子袁澄是清華的同學，她那時曾去過袁家多次。資的回憶錄中這麼形容袁家在北京金魚胡同一號的住處：「我第一感覺就是『真大』，前廳是黑白花磚地，我說這個廳裏跳舞、搭台演戲，袁澄說原來是可以拴馬的。見到袁老先生一面，他不苟言笑，在他面前我似乎只能屏息而立，恭恭敬敬地回答幾個問題。」^⑫從資對袁家在北平住所的生動描繪中可以看出，袁同禮此次抵美之後，全家都經歷一場生活上的鉅變。為境遇所迫，這位在國內功名成就、年逾天命之年的「袁老先生」，還需在異國他鄉重新起步，為求職、謀生奔忙。以居住而言，袁家在華盛頓的住處一直不大。1955年3月趙元任、楊步偉夫婦拜訪他們，袁同禮無奈向他們坦承：「可惜我們住處實在太小，恐怕住的不舒服，否則十分歡迎在此下榻。」（第四卷，頁2148）

那麼，既然反差如此之大，袁同禮是否有暫居美國、尋機回國的打算呢？袁清在其給《年譜》寫的序言中有「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係決裂，台灣政情又有白色恐怖，他只好在美國留下」這樣的敘述^⑬。袁清那時雖然只有十三歲，但他的回憶應該可信。同時，袁同禮儘管已經離開了北平（1949年改稱北京），但仍就館務的事情出面與各方聯絡，履行北平圖書館（1950年改稱北京圖書館）館長的職責。1950年5月，他聽說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思德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招聘館長，他向胡適表示對此職位有興趣，但也只是說「此事如能實現，則在美可留二三年」。如所周知，後來胡打算出任該館的館長，袁同禮聽後十分支持：「普仁斯敦〔普林斯頓〕事是一極大榮譽，將來如能打開一條路，亦一大收穫，於中美文化促進貢獻極大。」胡之前曾向他解釋，決定就此職是為了「先去Princeton打開文史的一條路（Humanities），然後請守和兄來專力整

理 Gest」(第四卷，頁 1891-92)。如上種種，可以知道袁同禮剛到美國的時候，還抱有在異鄉棲居一時的心態。

袁同禮離開北平圖書館之時，將館務交給曾在歐美訪問多年、1947年回國的弟子王重民。1949至1950年間，王重民曾多次致信袁，描述了解放軍接管北京後的情況，向其匯報館內發生的事情，並多次表示希望袁回國。譬如1949年1月8日王重民給袁的信中說：「時局不論若何變化，吾館大概沒有變化。若環境許可，吾師與其晚來，不如早來也。請詳細考慮，是所為禱！生之目的，亦唯在早晚歡迎吾師回來也。」幾個月之後，王重民又寫道：「今日奉到四月十八日手諭，捧讀之下，極為歡樂。想師母、師兄、師姊等，必定都好，都快樂。望早早給他們找好學校，即可留在美國讀書，而吾師和師母，則應快快返國，不必待到明年也。」1950年11月王重民再次加以催促，並建議袁回國的路線，最好假道歐洲更為安全。他說那時鄭振鐸、王冶秋擔任文化部正副部長，他們兩位也都希望袁盡速回國。王重民這麼寫道：「奉到手諭後，即和鄭西諦〔鄭振鐸〕、王冶秋商議，他們都非常歡迎吾師早早回國，繼續發展我圖書館事業，多多為人民大眾服務。」(第三卷，頁 1792-94、1838-40；第四卷，頁 1923-24)王重民還告訴袁，自己已經兼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事實上，除了王重民之外，原北平圖書館的其他同事在與袁通信的時候，也都表示熱切希望袁回國繼續主持館務。從他們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共接掌政權之後對知識界人士十分禮遇和器重，整個國家呈現百廢待興、蓬勃向上的景象。

袁同禮最終沒有回國。在胡適就任普大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之後，他也於1951年接受了費正清學生、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負責中文館藏的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邀請，出任該校中文編纂主任，不過並非長期聘用，於1953年任期結束(第四卷，頁 1968-84)。直到六年之後的1957年，袁才正式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員。但從後視的眼光看，他1949年後沒有取道回中國，而是在美國忍受了多年冷遇，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因為那時回國積極投身建設祖國大業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不少人的結局最後頗為悲慘。以王重民為例，他在1950年入職北大，建立圖書館學系，擔任系主任。他幹勁十足、春風得意，在教學之外，撰寫了大量著作，如《普通目錄學》、《歷史書籍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料》、《近代目錄史料》、《中國書史》等。1957年袁正式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員，而那年王則在中國被打成右派，撤銷職務並降級、降薪。後來他雖然被摘掉右派帽子，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又受到嚴厲批鬥。面對政治強壓，他不願屈從江青的意志，將一部託名李贄的《史綱評要》認定為李贄的作品，而且找出更多證據說明這是一部偽書。他這麼做可想而知的結果就是繼續受到批判，但他不甘受辱，最後於1975年在頤和園長廊自縊身亡^④。設想一下，如果袁在50年代初選擇回國，以他的留美學歷、在民國學界的地位、國民政府所任的職務及與歐美人士的頻繁交往，即使他能躲過反右和四清等政治運動，在文革開始之後也一定會被紅衛兵扣上「美帝間諜」或至少「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被狠狠打倒和遭受身心的折磨。

與王重民的慘痛遭遇相比，袁同禮晚年雖然在美生活不易，但他不折不撓，編纂了多部著作，成績傲然。美國國會圖書館負責中文圖書管理的現任館員常易安(Ian Chapman)在其緬懷文章中寫道：「儘管袁博士作為圖書館學家、學者、教育家、管理者及外交家享譽國際，但他常坦言：『我只是熱愛編目工作。』」^⑩在遷居美國之後，袁得以孜孜以求他的這一志業。首先要說的是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工作，那就是繼續其弟子王重民的工作，保管和校訂中文善本，最後整理成詳細的目錄——《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⑪。此外，袁在此時還着手編纂了《新疆研究叢刊》和《胡適先生西文著作目錄》等，足證他對編目工作的熱愛和投入^⑫。

其次，晚年袁同禮所從事的諸多編目項目中，以系統增補法國漢學家柯蒂埃(Henri Cordier，又譯考狄)所編的《西文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nica*)格外重要^⑬。柯生於美國新奧爾良(New Orleans)，但很小就移居法國，成年之後從法國去了上海，先在一家銀行工作，後來加入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又在中國政府派遣學生到歐洲的專案中擔任秘書長。在華期間，柯開始整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論著，推動了西方的漢學研究。回到法國之後，他擔任法國東方語言學院(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的教授，與人一起創辦了至今仍然十分重要的中國研究雜誌《通報》(*T'oung Pao*)。他所編纂的《西文漢學書目》收集了歐洲多種文字的漢學研究著作，於1878年初版，之後不斷再版。袁在美期間，向已移台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申請資助，開始續編此書目。此項工作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因為柯的書目涉及各種文字，如果希望收全，頗不簡單。後來袁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於1954年3月去了歐洲主要國家，為編纂書目走訪了許多圖書館，直到1955年2月才返回美國(第四卷，頁1936、2025、2076、2085)。

復次，袁同禮為編纂《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和《中國留歐大陸各國博士論文目錄》(*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⑭。這兩本目錄收錄詳盡，記載了作者使用的中外文名字、論文的確切題目和獲得學位的具體年份。可以設想，在那個時代要核實上述資訊，相當不容易。《年譜》中記載他為了核對資料，與不少相關人士通信，詢問資訊，而且袁還不顧年近古稀，出訪歐洲一個月。1964年6月18日，他又為此事和編修《中國藝術和考古目錄》的需要，再度去了歐洲，但在慕尼黑中途發病，只能匆促返美(第五卷，頁3004-3006)。7月中回到美國後，雖經手術治療，可惜終究回天乏術。然而袁依然堅持抱病工作，直至1965年1月15日才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退休。退休後未及一月，他便與世長辭，終年六十九歲(七十一虛歲——《年譜》所列歲數均為袁的虛歲)。袁去世之後，葬於華盛頓石灣公墓。他北大的老同學羅家倫書其碑文如下^⑮：

袁先生同禮字守和，具溫良恭儉讓之美德，抱溝通中西文化濟世之宏願，願噴智慧之泉，穆春風之化。夫人慧熙為袁太常昶孫女，淑德令聞，相輔益彰。

子澄、清，女靜，均克承庭訓，允繼家風。茲值卜葬華府，咸仰靈旗奕奕，永護鬱鬱佳城。

——學弟羅家倫拜撰並書

袁同禮在其人生的第三階段所完成的上述三項書目編纂工作，僅是他為圖書館事業奉獻的一個縮影，卻清晰映照出他赴美之後的精神圖景：雖漂泊異地，年事漸高，仍將全部心力傾注於編纂事業，為存續中華文脈、促進中西交流竭盡所能，可謂鞠躬盡瘁，至死不渝。與袁家聯姻之漢學名家、匹茲堡大學東亞系創始人王伊同，形容袁愛書如命，「流離顛沛者有年，固未嘗一日離卷秩。……得異書殘卷，則飛函友好，假抄影印，務廣其傳，蓋其好學嗜書也若是」。普大的宋史專家劉子健則著有〈恂說〉一文，其中寫道：「竊觀守和先生，誠如其名。雖時逢動盪，而事業輝宏。晚年顛沛，亦絕不怨天尤人。獨力編著，以嘉後學。此真自達達人，遺風可法者也。」在戰時便與袁結識的費正清，對其一生做了如下的觀察：「簡言之，袁先生是一個傑出的人材，以他的才力、精力及想像力，為學術努力。他不僅在他自己國內工作，也時時關懷到中西關係。只要他任官或居商〔，〕以他的才華，他不難富敵陶朱。然而，袁先生把他自只〔己〕奉獻給文化學術的進步。」如上這些評語，概括了袁同禮學術人生的瑩瑩大者，中肯生動^②。順便一提的是，筆者初識袁先生之名，正是在研究早期留美學生歷程時，得益於他所編著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該目錄收錄之系統、考據之嚴謹，至今令人感佩。袁的一生，堪稱二十世紀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生動註腳，也折射出現代中國學術在動盪中前行、在堅守中成長的曲折軌迹。

四 餘論

在結束本文前，筆者擬對袁同禮子女在美國的情況，以及自己與袁家、尤其是與袁清先生的交往略作補敘。前文已提及，袁同禮長子袁澄在國內期間曾就讀於清華大學，赴美後於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專研歐洲史，尤精德國史，生前執教於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州立大學(Worcester State University)。長女袁靜畢業於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後赴哈佛深造並獲博士學位，育有三女一子，均有成就，其中兩位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次子袁清曾求學於哈佛和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又回哈佛從事博士後研究，後在俄亥俄州的萊特大學(Wright State University)任教多年，直至退休。

筆者三十餘年前赴美留學，旋即加入了1986年成立的「中國留美歷史學會」(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並在學會組織的數次學術活動中聆聽袁清先生的演講，受益匪淺。袁先生退休後，遷居新澤西州，在毗鄰普大的平原鎮(Plainsboro)頤養天年。此後，我們在普大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多場學術

活動中屢次相遇。承蒙袁先生不棄，多次相約深談，榮幸地結為忘年之交。袁先生雖年近九秩，卻依然思維敏捷、學識淵博，每每交流皆令筆者獲益良多。本文初稿完成後，亦曾呈請袁先生過目，蒙其悉心指點，感激不盡。然文中如有任何疏漏或謬誤，則概由筆者一人負責。

註釋

- ① 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24）。
- ②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68;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82-89.
- ③ 另可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97、602。
- ④⑪ “Yuan T’ung-li”,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vol. I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91.
- ⑤ 袁同禮告知伯希和寄來的《元朝秘史》有缺頁，希望補上。參見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第一卷，頁452-53、552-53。
- ⑥⑬ 袁清：〈序一〉，載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第一卷，頁2；3。
- ⑦ 有關袁同禮在抗戰期間活動的全面描述，參見徐家璧：〈袁守和先生在抗戰期間之貢獻〉，載袁澄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80-94。
- ⑧ 有關袁同禮滯留香港的細節，參見柴宇瀚：〈回顧香港淪陷初期：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評介〉，《傳記文學》，第125卷第5期（2024年11月），頁129-36。
- ⑨⑩ 錢存訓：〈北平圖書館善本古籍運美遷台經過〉，載《東西文化交流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70；71-74。
- ⑫ 資中筠：《蜉蝣天地話滄桑：九十自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頁143。
- ⑬ 雷頤在其〈王重民之死〉一文中稱讚王重民，認為他的死是因為「他，容不下權力對學術、知識的褻瀆」。參見雷頤：〈王重民之死〉（2010年6月14日），經濟觀察網，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10/06/14/172691.shtml。
- ⑭ Ian Chapman, “Dr. Tung-li Yuan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 Four-Decade Relationship” (22 December 2025), <https://blogs.loc.gov/international-collections/2025/12/dr-tung-li-yuan-and-the-library-of-congress-a-four-decade-relationship>.
- ⑮ 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57）。
- ⑯ 有關這些編目工作，雷強在《袁同禮年譜長編》第五卷中多有提及。
- ⑰ Tung-li Yuan,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CT: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
- ⑱ Tung-li Yuan, eds.,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DC: 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1961);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DC: n.p., 1964).
- ⑳ 羅家倫：〈袁同禮先生之墓〉，載《思憶錄》，頁10。
- ㉑ 王伊同：〈哀守和丈〉、劉子健：〈恂說〉、費正清：〈我所認識的袁守和先生〉，載《思憶錄》，頁11-12、37、14。